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九死一生】	幸存者自述	周 群
【往事非烟】	我所经历的“红八月”	柳家新
【来龙去脉】	个人崇拜是林彪带的头吗	林蕴晖
【亡灵祭坛】	回忆史明远同学并寻思他自尽的原因	高越农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九死一生】

幸存者自述

• 周 群 •

周群 口述 陈秉安 整理

◇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阳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欧阳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

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洪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

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1965年全国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1965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100多名教师被召到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

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他们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迫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到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3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 第二次婚姻

想来想去，想起蛇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去投奔她了。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很多人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大队支书？是不是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蛇坝公社冲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10岁就带着两个弟弟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杀敌立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朝鲜回国后，先到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他当惯了农民，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1962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蛇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蛇坝大队要杀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他也参加了杀人。我在道县处遗小组的材料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1967年8月25日，蛇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蛇坝刮杀人风的时候，李自贵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说她老公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这件事对李自贵教育很大。

当时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蛇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也是这个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李自贵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做媒。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原因是他的孩子：两岁的玉新。当时我刚失去了3个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心软了。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3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在窗外干着急，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有两件农活我最难忘，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要用手去捧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了个地主婆。”“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下有了3个孩子，那是3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10元。结扎女方能补到20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1980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反，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2000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2011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3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44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

## 【往事非烟】

### 我所经历的“红八月”

• 柳家新 •

马萧采访、整理

受访人：柳家新

受访时间：2014年11月10日

受访人简介 柳家新：1947年出生于北京市西城区，“文革”期间系清华附中高三年级学生。1968年3月，作为“知青”赴新疆伊吾军马场从事农牧业劳动，1974年5月告别“知青”生涯从军，2003年从部队的工作岗位上退休。

马萧（以下简称一马）：请谈一谈“文革”初期清华附中和您的基本情况。

柳家新（以下简称一柳）：现在一般把“文革”开始的时间定在1966年，我那时已经19岁，在清华附中读高三，是在632班，当时毕业考试已结束，正准备参加高考，“文革”开始了。从初中到高中一共六年，加上“文革”，我在清华附中生活了8年。

清华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当时的校长是万邦儒。清华附中本来是清华北大教职员工的子弟学校，从1960年开始面向全市招生，从1960年到1966年短短六年时间，就迅速发展成北京市重点中学。

其实在“文革”前两年，学校的政治动向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当时，学校要求班主任老师注意培养出身好的学生，开始引导学生走向社会性的批判。之前，学校和老师评价学生是不讲究出身的，一般只看成绩、看人品、看平时的表现，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简单关系。后来，强调了阶级路线和家庭出身。

清华附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的比较多，相比之下，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比较少。一般说，干部子弟的学习成绩不如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子弟，而且有些干部子弟平时的表现也得不到同学、老师的认可，因此，在选择班干部，发展学生入团、入党方面，往往普通家庭的子弟更多一些，这就给外界一种干部子弟受到学校排挤的印象，同时，这些干部子弟也开始对学校产生不满。

这段时期学生中出了几件比较有影响的事情，一是“娄琦熊钢打架事件”，娄琦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熊钢是高干子弟，为人挺骄横，不太尊重其他同学。在初中时，他和另一同学王双记也曾经发生冲突，王双记是工人子弟爱踢足球，身体很棒，他看不惯熊钢平时的作为，在得知熊背后向老师打小报告后，明知要受处分，还是在教室里当众打了熊钢一拳。事后熊的家人来学校找校长，很快王受到警告处分。

而这一次，熊钢和娄琦两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打了一架，本来事情不大，但是，因为熊钢是高干子弟，加之当时高层对教育越来越不满，学校因此非常紧张，在处理的时候有偏向熊钢的意思，引起同学们的普遍不满。

还有一件事是“王铭入团”，王铭也是高干子弟，他通过关系转到清华附中。由于平时的表现并不太好，团支部在讨论他的入团申请时通不过，结果，他向上面写了一封告状信，学校领导感到了压力，赶紧把王铭发展入了团。

这种氛围在“文革”前慢慢地形成，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但还没有正式地搬到台面上来。进入1966年，学校的干部子弟就比较活跃了，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一些内部的信息，比如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知道毛泽东对教育不满，主张造反，于是对教育、对学校领导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校和老师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他们提出红色江山由谁来接班的问题，并且认为，父辈打江山，当然应由他们来坐江山，他们从小在革命家庭里长大，是天生的红色接班人。

马：请谈一谈“文革”期间您的个人经历。

柳：“5·16”通知出台标志着文革的大幕拉开，这些干部子弟（也包括其它出身的观点相同者）在酝酿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开始走向政治舞台，他们将矛头指向学校党支部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校长万邦儒，他们认定，解放十几年来教育界的领导权，一直被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他们表示，同学校党支部的分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我认为教育确实有问题需要解决，拥护毛泽东对教育现状的批评，赞成学生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而要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但我认为学校教育的主流是好的，是在逐步探索改革的，学校党支部不是修正主义黑党支部，持我这种观点的同学在632班是大多数。于是，双方就互相贴大字报，阐明观点，同时相互指责、批判。

6月1日人民日报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中央正式表明态度，鼓励学生起来造反，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校带头造反的干部子弟的士气。他们成立造反组织“红卫兵”，与维护学校一方的斗争越发尖锐激烈。此间，人大附中、四中、十三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还跑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后来他们也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的支持，主张造反的少数干部子弟的观点很快得势，而我们被批为“保皇派”，说我们是维护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而校领导则是修正主义当权派。在汹涌的大潮之下，红卫兵成了弄潮儿，校领导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我们这一派学生被运动打懵了。有的开始紧跟中央，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站错立场。有的联系五七年反右的历史经验，茫然不知真理所在。也有的内心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敢再公开论战。我当时就很迷茫，我们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大家都积极努力上进，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了？还有，斗争的方式也是我无法接受的，这本来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怎能随意去污辱他人的人格，动则谩骂，剃阴阳头，戴高帽子，然后拳脚相加，皮带狠抽往死里整。况且，校领导老师平时对学生都不错，从个人感情和道德要求来说，尊重师长也是起码的。

残酷的现实使自己感到那种认识太肤浅落后了，跟不上党中央的部署和革命形势，我们没有那些干部子弟觉悟高，斗争性强。很想通过“文革”，提高思想水平，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曾经是学校的五好团员，又是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自然



不甘落后。但很快我又感到实在接受不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而且，他们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的。

为了稳定混乱局面，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大学的工作组基本上和老红卫兵（高干子弟）捆绑在一起，因为这些工作组是中央直接授意的，但派驻中学的工作组有点不一样，他们是由团中央派驻下来的，工作组成员大多来自基层团干部，他们的思想往往和普通学生的想法更接近一些，他们也斗“走资派”，但不赞同老红卫兵们的有些做法，但没想到的是，这些老红卫兵们根本没有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放在眼里。

开始红卫兵虽然闹得很凶，但还没有真正掌握权力。到了7月份，工作组被赶跑了。这些干部子弟真正掌权，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变化，一是矛头不仅指向校领导，而且指向一般老师和普通学生，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二是由文斗升级到人身侮辱和暴力迫害。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之后，这种倾向更加严重起来。记得刚开始批老师时，有一次孔祥瑛老师走到教学楼前，有几个学生拦住她逼她吃路边拔的草，她是清华大学钱伟长的爱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特别忠诚于教育事业，对学生像慈母一样耐心爱护。她曾经是附中的校长，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后，她成为一名普通教师，但大家仍然很敬重她。“文革”改变了正常的师生关系，红卫兵激发人们畸形的革命行为。当时孔祥瑛老师沉着脸，不说话，坚决不吃伸到嘴边的草，后来，这件事情也没有继续往下发展，可能是周围的学生也感到太过分了。到后来，一些老师被强迫在雨中挖排水沟，扔石头溅水，拳打脚踢的现象出现了。到了八月中旬以后，掀起了赤裸裸的暴力行为。有个高二的的女学生被批斗后想不开，撞火车致残，还有一个女学生喝毒药自杀了。有一位年轻老师叫刘澍华，是学校团委的副书记，一天晚上和校领导一起被批斗，挨打很厉害，后来爬上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筒，从上面跳下来自杀了。

这几件事情在我们学校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班的情况比较特殊，保守派力量大，红卫兵势力单薄，所以，其他班的红卫兵们说我们班是“铁板一块”、“臭豆腐一块”。但也有挨过整的，不过不是在我们班上，而是在学校外面，在别的班里。张蕴环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副书记，是班里的唯一党员，在中学入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清华附中入党的学生总共不过四五人，张蕴环是其中之一，包括比我们高两届的刘延东，她也是在清华附中入的党。张蕴环姥姥家出身不好，被校外一些红卫兵批斗，她受牵连被剃了阴阳头，听说还挨了打，她很坚强很理智，回到班里一如既往做人做事，大家也一如既往善待她。我们学校还有一位年轻老师叫陈书祥，我们两家都住在蓝旗营。有一次，以北大附中红卫兵为主的一些学生，听人揭发陈书祥的父亲历史有问题，就闯到他家把他父亲给带走了，关在北大附中一处地下室内，当天晚上就被活活地打死了。当时他恰好回家见围了许多人不知出了何事，被邻居赶紧劝走了，如果贸然进家肯定没有好结果，假如再态度强硬据理力争，说不定还会搭上一条人命！

那时，这些红卫兵们下起手来心狠手辣，根本不会和你讲道理，听你的申辩，他们自认为真理正义都掌握在他们手上。

我们班里红卫兵虽然没有在班里整过人，并不代表他们不想整人，而是因为手中没有足够的力量，那时节敢打老师、打同学、打社会上的所谓黑五类是最革命的表现。后来，他们借其他班的红卫兵力量狠整了我们班上的同学。8月26日上午，他们要我们班同学都到高631班去接受教育，大家呼呼啦啦地往楼下去。我当时有点奇怪，因为631班的红卫兵闹得是最凶的，我们去他们班接受什么教育，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我拖拖拉拉的下楼，最后一个到达631班。果不其然，一班的课桌都弄到教室的边上，中间空出来一大块地，这是专门用来批斗的架式，红卫兵点一个同学的名，这位同学就要站出来跪下，然后，

由那些红卫兵用军用的铜头皮带、脚下的军用皮鞋一顿猛抽猛踢。一些人则在旁边呐喊助威，那种声音是疯狂的歇斯底里的，有个女红卫兵甚至脱下自己的鞋子，抽被批斗学生的耳刮子。见到这样的场面，我扭头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我们班马东迪同学被红卫兵一巴掌把眼镜给打掉了，一脚踢得跪下了。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叫宣夏芳，性格刚强，她出身工人家庭，没有历史问题，曾经写过“大字报”，批判过当时干部子弟的观点，影响很大，所以，红卫兵们恨得她牙齿痒痒的，早就想找机会整她。这一次，她也被点名了，想借机批斗她，她怒目一瞪，说：“谁敢！”，结果，把在场的红卫兵都给镇住了，竟没敢对她动手。

当时，也点了我的名，但我已经趁机离开回家了。于是红卫兵派同学来找我，让我回学校。下午，我去了学校，这时批斗会已经散了，我记得有六七个同学跪在教室里写认罪书，他们身上的白衬衫都被鲜血染红了，其中有我们班的郑国行、徐经熊等。看管他们的红卫兵让我去写认罪书，我没有照办，到五楼阅览室看书去了。郑国行同学出身于“旧军人”家庭，他父亲最后是随傅作义部队起义的。他在文革中一直不赞成红卫兵的观点和做法，被殴打关押之后，也一直不屈服，坚决不认罪，不断写“大字报”反击批判红卫兵的言行。他到我们班前曾因病休过学，“文革”挨打中肝肾脏受损严重，后来下乡插队两年就出现大出血，住过11次医院，终致肝硬化转为肝癌，在1997年不幸去世。

八月份，整个学校和社会都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红卫兵自诩为“红色恐怖”，又解释其残暴行为是由于当时北京发生资本家砍伤红卫兵的阶级报复行为，使他们被激怒。事实上，所谓资本家报复只是被抄家殴打的小业主家人有限的自我保护，所谓被激怒也只是一种借口和托词。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的行为充分证明：年轻学生的内心深处也有着违背人性的凶残基因。人们不能不思考：是什么使这些红卫兵变得如此疯狂如此丑恶？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文化根源在哪里？

八月份之后，社会上扫四旧打黑五类的风潮过去，这些红卫兵开始走下坡，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的父辈纷纷出了问题，他们也不理解了，变成自觉不自觉的保爹保妈派。毛泽东开始支持清华大学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大学红卫兵成为文革运动主力军。像揪斗王光美、围攻中南海、冲击各地党政机关，砸孔庙等，都是大学红卫兵干的，中学生红卫兵只是跟着他们走。

中学被批斗压抑的一派翻身了，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也尝到了平等的滋味，他们成立了各种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没有像大学那样揪住工作组不放，深入挖后台，而是反批那些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斗争的口号仍然还是批反动路线批走资派，校长继续做检查，但是不打人不施暴了，而且主要在校园里活动，不在社会上为所欲为。新红卫兵中不少人虽然挨过老红卫兵整，并没有回过头去报复那些整过他们的人。没多久，那些老红卫兵都借“串连”的机会离开了学校，或去了外地。

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去全国各地搞“大串连”，更多的是游山逛水，我和几个同学出去串联两次，一次到长沙、韶山和兰考，一次到延安、重庆、武汉，兴趣点是革命圣地、英烈故地。除了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不参加当地的运动。仅有一次在重庆大学看到有我校老红卫兵齐向东战斗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后，连夜写了批判这篇文章的大字报张贴在重庆大学。引起不少人关注，大字报上留下很多支持的评语，后来我们到武汉后，还见到转发我们的大字报。

“大串连”期间，吃、住、行全部是免费的，每个学生只要带张介绍信或身份证明都能领到“乘车证”，在各地的火车站，当地都安排了“革命师生”接待处，专门接待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红卫兵，负责安排这些人的生活。

“大串连”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此之前，我虽然已经二十岁了，但一直没有出过北京城，不知道中国其他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不知道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和表现，我们相当于作了一次免费的旅行，得以“经风雨，见世面”。

这段时间，老红卫兵逐渐被边缘化，产生了失落、不满的情绪，他们还曾经组织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发泄过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冲击过北京的公安机关。有些人被抓了又放了，有些人当逍遥派了，也不来学校了。也有些老红卫兵转变立场，和新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继续参加运动。像我们班杨文华、王淑梅等就参加我们组织一起批反动路线，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说他们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否定文革的。真能自我标榜，他们只是出于个人或家庭遭遇对中央文革某些成员发过牢骚不满，从没反过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真正有思想，敢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错误的人后来都被判刑或枪杀了，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

我们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央的路线和文革的一系列做法，虽然个别事情上有看法，但总认为是下面的问题，是枝节问题，是难免的矫枉过正问题。比如，血统论，打倒一切，武斗等。

大串联到1966年底宣布结束，但学校里仍然冷冷清清。1967年初，中学开始进驻“军训团”，由军队介入，收拾中学的无政府状态。那时我们都已经毕业了，但没有升学考试，也没有分配工作，个人的档案还在学校。所谓“军训”，其实就是“军管”，部队插手来控制学校。

当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林立，谁也不服谁，“军训团”就把所有的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井冈山兵团”，这是仿效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成立了领导机构勤务组，替代学校原来由老红卫兵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也是勤务组成员之一。

但这些都属于群众组织，代行权力，并不是正式的权力机构，实际权力掌握在军人手中。

1967年，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这时学校掌权的是老红卫兵之后的红卫兵。他们内部也有不同观点，后来又发生尖锐冲突甚至武斗。“中央文革”就这个问题连续在4月3日、4月4日下发了两个相左的文件，这就是中学“43派”、“44派”的来由。这一年，因为清华附中是重点中学，又是红卫兵发源地，中央需要了解情况时，常常让清华附中派代表参加，我就多次参加过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戚本禹等人召开的会议。记得一次，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召集三个中学的代表了解中学各派问题，还问我属于哪一派，我想了一下，说我属于不三不四派，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43派”和“44派”到底是什么区别。不管是“43派”，还是“44派”，当时都是紧跟党中央的，不过对某些具体问题，有的激进些，有的温和些。

1967年初，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还到下面去搞“步行串连”。他们去天津的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持受压迫的造反派，结果，因为这些同学支持的一方势力小，而他们反对的那方势力大，所以就被扣押在当地不让走。有个同学回来找到我求助，我二话没说拿上一份中央给中学搞军训的文件，借了一辆破自行车，和那个同学骑了两百里地，从北京到蓟县去

解救他们。那时还没有许多柏油路，大部分是土路、石子路，我们骑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到达目的地，我找到村里面管事的人，说：中央有精神，学生必须回学校去参加“军训”，学生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不参与你们的运动。当地的人见我带同学走，不再掺和当地的事情，所以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我们一起回到了北京。

军训团抓的一件大事，是复课。各班开始上课，没问题的老师也恢复上课，但过去的教材不能用了，因为那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老师也心有余悸，也不知道应该教什么，所以军训团就临时安排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高年级学生给初中生讲课，试探着一步一步恢复学习。那时大部分学生都返校了，也有少数学生在外串连没回，有些同学则去了工厂，自己选择去工作，工厂也不开工资，给你安排一个住所。我在学校也当过临时教师，给初三年级上语文写作课。

到1967年下半年，“井冈山兵团”各派之争越演越烈。有一次，他们相互打起来，一派在教学楼，一派在宿舍楼，中间隔着一个操场，相互指责、谩骂，用弹弓互射，我去学校的广播室，把两派的人都骂了一通，但没有用，制止不住，但当时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斗，不过已经有这种倾向，见面之后双方都想动手，图书馆、阅览室的书籍，实验室的东西，都被抢被砸被偷，没有人管，也不服管，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秩序建立不起来，连“军训团”也管不了，除了政治观点和思想路线分歧，我感到两派之争的实质，也许就在谁将来能进入校革命委员会这个正式的权力机构，谁能够控制这个机构的问题上。老红卫兵争的接班权，新红卫兵争的领导权，看来，无论什么革命，什么造反，核心的问题是夺权掌权！中学和大学一样，派性斗争到1968年夏天发展成大规模武斗，那时我已经离开清华附中，去了新疆。

我觉得“文革”及红卫兵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什么？它的经验教训反映在哪些方面，应该有一个全面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回避或简单的否定，不是一个严肃的执政党应有的立场态度。红卫兵奉行过的“血统论”、“天然接班论”、“阶级斗争论”、“暴力专政论”“无限忠诚论”等等，虽然遭到批判和唾弃，但并没有得到清算，依然存在复生的土壤，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文革”发生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亲身经历者越来越少了，我们有责任让事实说话，还历史本来面目。

马：请谈一谈您的“知青”生涯。

柳：1968年3月，我向“军训团”提出“上山下乡”的要求，之所以萌生这个想法，一是因为学校太乱，争权夺利没意思。还有，在1967年底，我们曾经欢送过一批赴内蒙插队的本校学生，这是清华附中最早的一批知青，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去向很好。那个时候，我们满脑子想的是哪里艰苦往哪里去，锻炼、改造自己，自食其力，报效祖国。

因为平时的工作关系，我与“军训团”一直配合得很好，军训团马凯团长不愿意放我走，曾给我两个机会，一是去解放军1201印刷厂，在北京有名额，另外，将来我愿意还可以留校。后来，新疆军马场招人，清华附中有五个名额，我觉得挺好，新疆是边疆地区肯定远，军马场养马很新鲜而且是军队单位。军训团支持了我。

出发的时候我有心理准备，知道那里的环境一定是很艰苦的。到了现场才知道，那里的条件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一是天气寒冷，3月份北京已经春暖花开，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在天山以北，流传那里“六月飞雪，八月降霜”。到哈密后，我们是披着棉被坐的敞篷大卡车，翻过天山的。二是居住的条件非常差，有一种叫“地窝子”，是往地底下挖出一个大坑，上面盖一层稻草或席子，屋顶开个窗子，就是居所，一到冬天下大雪，到处是一片白，

根本找不到屋子，有时候骆驼经过这个地方，都会掉进屋子。当时，盖这种房子，有一个好处，主要是简单容易建、成本低。我们知青刚去时住的房子，四个角是用砖砌起来的，墙壁用土夯实的，这是当时军马场最好的房子。

军马场是1954组建的，当时都是军人，后来变成军队企业单位，既不是现役的部队，也不是当地的农牧民。最兴盛时，有一万多职工家属，分为四个大队，二十多个生产连队。全场100多万亩草场和耕地，生产连队与生产连队的距离有几十里地，除了养马，还种燕麦、油菜。放马地点不是固定的，随季节的变化，夏天，驻地周围种满了庄稼，就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大山里面去牧马，要过几个月的游牧生活，带着帐篷出去，生活物资由连队派人用骆驼运到游牧地，这条沟里的草场吃得差不多了，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山沟，等到山里寒冷了，农田的庄稼也收割完了，再把马群赶下山，回到驻地，在草原上呆半年。到驻地后，白天就把马放在草原上、山坡上，晚上回到马圈里，再吃夏季收割储存的青草，另外，还得给马喂盐、胡萝卜、豆类，种马还要吃鸡蛋。

当时放马是六个人一组，1人负责白天，2人负责晚上，1人负责做饭菜，轮替放牧、做饭、休息。遇上有种马的马群还是好管理的，因为种马会把自己的母马、幼驹都管在身边，因此，马群不会跑散，哪怕是两三百匹马，都不用太担心。但如果是马驹子、骡子群，哪怕只有一百多匹，都很难管理，因为它们会四处跑，另外必须防狼，我们都是随身带枪放牧的。

处于牧马第一线的同学都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女同学，“知青”刚到的时候，连上马都难，不熟悉马性，遇上性格不好的马匹，它不让你上马，人骑上去，它左蹦右跳，会把你从马背上摔下来。有时候，它在奔跑的过程中，突然之间来一个急停，骑马的人就会从马背上飞出去。还有，不时有人被马蹄子踏伤。到了冬天，牧马人要穿厚厚的毡鞋、羊毛裤、羊毛大衣，戴羊皮帽，光这副行头就有二三十斤重，遇到下雨天，会有五六十斤重，连马蹬子都很难踏上去。

夏天，在大山里放牧，住的是帐篷，做饭取暖必须生柴火，上半夜一般能维持温度，但到了下半夜，帐篷里就变凉了，如果遇上风雪冻醒了，就起来烧火，如果懒得动，就得忍住寒冷。冬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过，室内有用砖砌成的“火墙”，炉子里烧的高温气体在“火墙”里，能够保持室内的温度。军马场的生活要比当地老百姓好，因为粮食都是由部队直接供给，而且大米、白面等细粮比较多，此外，还自己还生产牛、羊、猪，肉类也有保障。

军马场的人口来源，有几个部分：最早一部分由部队的军官、士兵构成；后来变成企业，一部分来自当地的农牧民，经过政治审查吸收的；一部分来自转业的官兵，在1957年“反右”之后，东北有十万转业官兵，有一部分人从黑龙江转到新疆；还有一部分是内地的农村青年，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农村“支边”青年，一部分是三年“大饥荒”期间从内地进入新疆的“盲流”，其中有生产队长带着老老少少自流来的；另外，还有少量大中专毕业生。民族成份的构成也很复杂，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我们北京一共去了100多名知青，刚去的时候，集中在一起劳动，先适应那里的环境，修水渠，我们的连队被称为“红卫队”，半年多之后，被分到各个连队，大的连队分十多个知青，小的连队分五、六个。

当时，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就是服从党的安排，我在那里做过牧工，干过农活，后来调到场部政治处搞宣传。

刚去的头几年，我的想法和多数知青一样，都是志愿参加边疆建设，和工农结合接受再教育，扎根马场一辈子。那时我们有个口号“活在马场，干在马场，死了埋在松树塘上”。当时，我们和当地的农民相比，生活要好很多，有固定的工资，每个月包括地区补助有30多块钱。因此，我们都比较安于现状，比较满足，唯一的不足是离家太远，但有新鲜感。而我比其他知青则更幸运一些，我在生产连队只干了一年多，就到军马场机关工作了。还有，我们和维吾尔人生活在一起，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例如婚庆，库尔邦、肉孜节，赛马、叼羊、姑娘追等。维吾尔人待人非常热情、诚恳，你只要看见他们的帐篷，只管进去，他们一定会给你沏奶茶，切烤馕，家里如果有奶皮子还会给你加一点，这是最基本的待遇，如果家里还有好东西，也会给你吃，这是和在北京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当时，以知青为主组建了文艺宣传队、篮球队，经常到连队和附近单位演出、比赛，给当地贫乏的文化生活带来很多亮色。

我们这些知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有精神上的追求，爱学习，爱读书，爱收听广播，但是在新疆的边远地区，能看到的书很少，而且像《牛虻》这样的书都属于黄色书籍，禁看的。打开收音机，外国电台主要是苏联的莫斯科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电台等很容易收到，都是用中文广播的，有的知青一听是这些节目，就马上把广播关掉或者调换频道，因为这些电台都是“敌台”，收听是要犯错误的。也有的知青胆子大，好奇心强，私下里收听过这些电台的广播，有位同学叫李维建，他是人大附中高三的，被人揭发偷听“敌台”，受到了惩罚，农工普遍调级的时候，不给他调，还把他从医院调到了条件艰苦的水利队。多数人生活的还算比较满足，有滋有味。1969年北京6名女知青成立了巴里坤草原第一支女子放牧班，以后陆续组成包括乌鲁木齐知青和马场子女的女牧马班，受到广泛宣传和赞扬。有的知青还在马场结婚生子安家落户。

这种状态持续到1971年，有些知青开始离开军马场，他们或者是工作调动，或者是当兵，或者是上学，总之，以各种理由走了，开始时，我们还批判他们是逃兵，不能在艰苦的地方扎下根来。但他们的陆续离开毕竟挑战了我们曾有的信念，大家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真的要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吗？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林彪事件”，还有“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对我们所有人更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冲击，1969年开“九大”的时候，林彪还红得不得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林彪就出事了。一直以来，我们对毛泽东是无限崇拜的，特别是文革后，早请示、晚汇报，连我们在外牧马进行交接班时，都是虔诚地面向东方，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天天如此。而今，林彪也成了反党反革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信仰的那些东西都是正确的吗？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以后的道路该怎么走，毛泽东那种神一样的地位在我们心里慢慢开始动摇。

从1972年开始，军马场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以后是通过考试上大学，一些人从我们中间离开了，去了内地，回了北京。再后来不断有人调走返城，剩下的知青越来越少。1969年、1970年乌鲁木齐到军马场两批知青，一共有500多人，两三年时间，基本都走了。这种情形冲破了我們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和决心，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疑惑已经不是需不需要继续扎根的问题，而是在思考文革，思考上山下乡，思考中国的未来。

我离开马场完全是出于偶然，因为搞宣传经常写材料，我有机会参加上级机关召开的一些大型会议，接触到上面的人，知道军马场有几个写材料的，还是北京的学生。当时，北京总后勤部要组建一个工程指挥部，驻地在青海格尔木，负责建设到西藏的输油管线，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青藏高原是比新疆更艰苦的地区，这条管道1973年开工，我在1974年被调入这个指挥部，我便以这种方式被应召入伍，告别了知青生活。

□ 原载《共识网》

~~~~~  
【来龙去脉】

个人崇拜是林彪带的头吗

• 林蕴晖 •

提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个人崇拜，人们的第一反应就会想到林彪。但是，建国以后的个人崇拜，是不是从林彪开始？可能就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了。研究中国20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的起源，既无意为林彪开脱，也不是为了寻找谁是“罪魁祸首”，而是在于反思这种个人崇拜何以会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

◇ 林彪“高举”始于1959年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总纲。鉴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1日就致信刘少奇等中央书记处成员，提议在正式文件中把“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建国以后，从1952年到1954年，毛泽东又多次在文件中提出作这种改动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4年12月5日专门就此问题下发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通知解释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决议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审阅时还加了一句：“在写文章作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因此，中共八大党章总纲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再写“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林彪在建国后的讲话中提“毛泽东思想”，从现有文件看是1958年5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其中在讲到学习军事科学时，批评了有人认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科学的”说法。他指出：“凡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而又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的，就是真理。”“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他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创造性的发展，我们要好好学习。”然后说：“学习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这次讲话，提到毛泽东思想的话语，还比较平和的话，到1959年9月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的调门就高了很多。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的话，就出于此。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上面这两次内部讲话，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59年10月，林彪就任国防部长以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写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红旗阔步前进》。从此，林彪就成了“高举”的代表。

进入20世纪60年代，林彪的调门又进一步升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历史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声浪中，林彪确实起了第一吹鼓手的作用。但历史同样表明，林彪并不是第一个拿起高音喇叭的人。

◇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歌颂

上述“经典”概括，无疑是林彪的创造。但这些基本观点，并非林彪的“专利”。请看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

在小组讨论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中，有的代表发言说：

要彻底破除迷信，做到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不存在迷信的问题。过去偏重学马恩列斯原著，而对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得不够，今后干部必读，应以学毛著为主，这是活的辩证法，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多次讲话后的小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对毛泽东歌颂的声调不断升温。湖南组认为：

我们党是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的。主席第二次讲话中谈到，有人说只要跟着主席走就不会错。他说又要跟又不跟，要有独立思考，要看真理在谁手里，只要谁手里有真理我就跟。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毛主席谦虚的高尚的风格；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因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广东组认为：

主席的讲话对我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将发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云南组在讨论中说：

中国有六亿人民，又继承了马列主义传统，我们出现了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像当时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革命问题，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光学以往的东西。

江苏组讨论中，大家领会到：

主席讲话再次教导我们，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要插旗子，要把人民的旗子、唯物辩证法的旗子、马列主义的旗子插到各个角落里去。主席提的“工农兵学商”前面加一个“思”字，也就是这个意思。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在社会主

义国家来说，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主席提出的农民问题，印度、印尼、意大利、法国……都存在这个问题，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跃进。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但是，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主席的著作，不去努力钻研，却转而向外国的书本寻找经验，这当然还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现。毛主席的著作不仅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事实说明，围绕着毛主席的著作来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对于我们更为有效。

对这次大会的情况，当年《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

代表们讨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指出了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巨大意义。……大家还特别强调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学习他的著作，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榜样。

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发言对毛泽东的歌颂，如：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真理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等话语中，不难看出，20世纪60年代林彪所唱的高调，已经露出端倪。

◇ 反对个人崇拜的中共八大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是与1956年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相悖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并写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956年4月5日正式发表。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公开表态。文中说：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共八大也曾公开表示反对个人崇拜，并作过明确的阐述。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邓小平还说：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通过的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文件。

◇ 毛泽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但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却作了另一番解释。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反个人崇拜，“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这个结论一下，不只彻底推翻了八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而且给主张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毛泽东何以这时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根源在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年的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否决。据邓力群回忆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

接着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了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问题。此后一个时期，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不再提及“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内容。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了他，推翻了他的“多、快、好、省”路线。

于是，毛泽东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反击。他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反冒进，“这是政治问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指责国务院是搞“分散主义”，强调权力要集中于“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进一步升级，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一再升级的氛围下，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人们纷纷发言说：

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

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柯庆施更高唱：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也有明白的说明。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尽管与斯诺的上述谈话是针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但同样也是他发动“大跃进”所需要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为维护他树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也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就更需要搞他的个人崇拜，他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高度赞扬充分表露了这个意思。林彪在此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词，正是他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刻感悟。

◇ 历史的教训何在

由上可见，中共党内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方面的重要教训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作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

有鉴于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

□ 原载《党史博览》

~~~~~

## 【亡灵祭坛】

回忆史明远同学并寻思他自尽的原因

• 高越农 •

## ◇ 前言

在《良知的拷问》里，作者孙怒涛说：在派驻清华园工作组的政治高压下，几乎所有‘蒯派’都遭批斗，“史明远老师，一位英俊有为的青年教师，不堪批斗……自杀了”。为主编《清华文革回忆反思文集》，他最近又说：“对于清华文革十年中的死难者不能只留下一个名字，史明远老师是清华文革中第一位遇难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心里纪念他，缅怀他，还应该用文字记录他，留存他。”

作为史明远的同班同学和挚友，我撰写《回忆史明远同学并寻思他自尽的原因》既是为了“留存他”，更是为了谴责逼他走上自尽路的一党专制制度。

史明远的自尽，发生在文革最初期的清华园。自九一班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几位同学，2013年整理出了一份《关于史明远留校工作以及在文革初期的遭遇》，回顾了他自尽的前前后后。

兹摘引如下：“史明远1959年毕业后，……被调入510教研组。调去510，可见系领导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文革开始后，史明远关心运动的开展情况，经常观看各种大字报。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开始与持不同意见的蒯大富等学生展开辩论并组织对蒯等批判，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抓‘蒯派’人物。工作组认为，史等油印这张传单以及抄成大字报贴出是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反对工作组即反对党中央。此外，史还提出，当时进入510教研组的工作组人员必须通过相应的密级审查，并向上级工作组领导提出了要求。此举反被

工作组认为是对工作组明目张胆的抵制，成为其‘反工作组’的‘主要罪状’之一。于是，工作组将史等人打成反工作组的反党小集团，将史定为小集团头目，在上班时将他们几个人分屋隔离，责令他们交代问题并相互揭发，同时在教研组范围开展批判。一区（注：510所在的需凭特别出入证才能进入的教学区）走廊内贴满大字报，声势甚为凶猛，给史等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上述背景下，史一定会联想到57年以后右派分子悲惨命运的情景，认为自己将来的前途也很暗淡。”“1966年7月5日，史明远不堪忍受工作组巨大的威逼与压力，出走明十三陵服敌敌畏自尽。”

我很认同上文把史明远的自尽与反右运动相联系的看法。

## 一、说说反右派运动在自九一班的情况

### 1）自九一班的由来：

为了给‘两弹一星’事业培养人才，清华大学在国内率先于1956年秋在电机系里成立自动学和远动学专业，简称自动控制专业。新组建的自九一班是该专业的首届正规班，成员均从本系电机、发电、工企电气化三个专业的二年级选拔，电九三的史明远名列其中。全班同学27人都是党、团员（5名党员）。

### 2）1956—1957年度的自九一班：

1956—1957年度国际大事接二连三，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了秘密报告，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党总支按照上面的统一布置组织各个班级学习。虽然我班多数同学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功课上，并不把参加政治学习当作分内事，但是对于政治学习还是颇为认真的。在我以班团支部书记身份主持的多次全班讨论会上，很多同学按照理工科学生习惯的思维方式，提出各种疑问，发言踊跃。

### 3）反右派运动在自九一班的情况

北大“5·19”后，（注：指1957年5月19日，北大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党小组接到突然通知，让分散地到北大看一个小时的大字报，回来开党小组会商议对于大字报即将蔓延到清华园的对策。党小组长刘光的意见是，群众有不满甚至偏激，我们要谅解，要肯定大多数群众的真诚。党小组于是在其后的第一次班会上就向全班同学诚恳表态，欢迎批评。虽然有个别同学向党小组提出有没有内定黑名单这类质问，但是，并没有形成纠缠。

自九一班被认为是在整风鸣放时期“烂掉了”的班级。其主要原因是：在党小组的带领下，全班都参与和支持鸣放，反对压制鸣放。

党小组长刘光带头贴出了题为《毛主席的儿媳妇》的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思齐被选派留苏一事；为了批评校团委书记阮铭在自由论坛上对揭露肃反黑暗的冯国将同学的“打棍子”，文郑麟以党小组代表名义登坛予以驳斥。武玖龄和文郑麟在班会上，泄露了他们在党委扩大会上听到的关于要开始反击右派的内部讲话，引起群情激奋。发言者均认为党委常委里的某些人现在完全是在背着蒋南翔搞反扑，违背了蒋南翔在清华礼堂所做的关于整风动员报告的基本精神。刘光说，若让他们得逞，后患无穷。

另外，林邦瑾同学贴出了《释‘还政于民’》的大字报，以犀利的文风有力地支持了企九班马琦同学《还政于民》的政治诉求。

反右后，全班被整肃，6名同学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其中党员4人（刘光、武玖龄、曹毓慧、文郑麟），团员2人（林邦瑾、宋鸿恩）。我虽然没有被‘戴帽’，但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谢贤亚同学受到团内记过处分。因为连系党总支也“烂掉了”，所以，在反右初期有上面派出的工作组一度介入我班的反右。工作组成员说，在地下党时期，因无意泄露致使同志被捕的，也要按叛徒论处。因此，这次给这么多的同学‘戴帽’，你们就可以想通了。

事实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自九一班同学始终都想不通：

（1）为什么这么多的（比例高达22%）品学兼优的同学在顷刻之间就成为了敌人？  
（2）为什么右派分子会如此遭难：一律被停止学业？（注：非保密专业的不属于‘极右’的右派分子还能继续跟班学习。）被强制劳动改造？

被‘戴帽’是折寿的。迄今全班同学死亡人数是6，其中的3名是右派分子。

对于幸免于被‘戴帽’的同学而言，眼睁睁地看着‘朋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戴帽’而成为新社会的‘新鬼’，精神上所受到打击和摧残是无可名状的。

## 二、关于明远的记忆

明远英俊。偏高的身材，浓眉大眼，炯炯有神，谦和，话少。

1）在学习上，他是佼佼者。他曾获清华大学1955—1956年度学习优良奖状（获奖条件是全5分）。1959年2月的一天下午，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褚家晋带领我和明远等四同学到坐落在北京清河的电科院，听取了一位技术员讲解一张苏联40年代的电力系统具有应答功能的遥控电路图。次日褚就让我们按这张图纸把它制作出来。在我还有点发蒙的时候，明远慢条斯理地点出了关键，使我豁然开朗。我反躬自问，同样地听了讲，为什么独明远能够如此迅捷领会其精髓？

2）1958年初春某周日晨，班长带领我们10来个同学携带着两、三个水桶顶着西北风骑车到农村‘除四害’（田鼠）。风太大，任务取消。明远拽着我说，何不骑行到苏联展览馆过一把电影瘾。我应声说好，两人就顺风直奔展馆电影院而去。一路上几乎没有踩脚蹬，就来到了目的地。我们看了连场电影：苏联彩色电影《初欢》和国产黑白电影《柳堡的故事》。散场后，风力不减，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逆风骑得筋疲力尽，终于在宿舍灭灯前赶回。

在清华园的日日夜夜忙功课的岁月里，这是我们少有的一次纵情尽欢。

3）明远是我的挚友。我深深感觉到这一点其实是在毕业以后。1962年12月我因公返回清华园在静斋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某晚，我到单身教工宿舍找到他。面对同室朋友的‘揭发’，支支吾吾，送别时，他在走廊里直白地向我讲述了一个女学生怎么进入了他的生活的故事。他说，当她初表爱慕的第二天，他就向领导做了汇报。

两三天后，我们相约在二校门附近散步，在和煦的阳光下彼此敞开心扉，讲述别后3年来的甜酸苦辣。我的印象是，他的事业刚刚起步，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正是由于有了这次散步，才使他会光临1963年8月我和前妻陈纯在南京举办的婚礼。他是出席晚宴亲友中唯一远道而来的。他的到来，出乎我的预料，我倍感兴奋，兴冲冲地到下关火车站迎接。我至今仍然记得他的赠品：一对浅蓝色的玻璃花瓶，两本蓝紫色塑料皮的日记本。他回上海老家的时候，我没有顾得上为他送行。谁曾料想到，他活生生的身影从此就会永远消逝？！

4）史明远性格内向。我所以觉得他内向是因为即使在相对比较宽松的学习‘两论’的讨论会上，他也几乎不发言，与内向相伴随的是有一点谨小慎微。正如他电九三班很要好的女友张慧中在后来的回忆中所概括：“我对史明远的最初印象是腼腆，不爱说话，遇到有趣事微微一笑。”“从逐渐的接近中，我能感受到他的性格平和，谦恭，善良，不爱抛头露面；他对人真诚，重感情，善解人意；他渴望得到真挚的友谊和爱情；他喜欢过宁静的与世无争的生活。”

### 三、寻思明远自尽的原因

明远并没有留下遗言，对于他自尽的原因，我只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

1）明远自尽的背景：自尽发生在1966年7月5日，其时，文革方兴未艾。但是，批判《海瑞罢官》的文革号角早已吹响，‘516通知’已经发布，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已经发表，北京的中学从6月初已经开始停课，“三家村”已被攻陷，其“头目”邓拓已经在6月15日自杀，北京大学已将包括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内的40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揪上“斗鬼台”批斗。刘少奇分别在6月1日和8日向北大和清华派遣了工作组。6月19日，清华出现了公开驱赶工作组的情况。工作组在抓“蒯派”人物的名义下抡起了新一轮反右派的杀威棒，其穷凶极恶从王光美在1967年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可见一斑，她承认：“还发生了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的严重事件。”

2）明远自尽的内在原因：他失去了独立思考他把自己的前途系于组织的信任上。所谓组织就是党组织。他太相信这个党的‘伟光正’了。清华大学一贯实行的党化教育使绝大多数受教育者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够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因此而深信失去组织的信任，就会万劫不复。此外，在性格上，他也存在弱点：承受不了迫害，承受不了委屈，正所谓“佼佼者易污，皎皎者易折”。

自蒋南翔以降，清华大学历届党委对莘莘学子进行党化教育是费尽心机的，真正做到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孔不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远是毛泽东—蒋南翔党化教育的牺牲品。

3）明远自尽的外在原因：肃杀的氛围在一个正义能够得到声张的社会里，再大的冤屈是没有很大的杀伤力的。当事人总会存有沉冤昭雪的念想。置史明远于死地的是1949年以来，令知识分子们乃至一切有独立见解的人窒息的政治环境，那种旷日持久的阴森森的肃杀的氛围。

它是从斯大林那里传承过来的，历经杀AB团、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延安整风、土改运动、镇反、肃反、思想改造、反右、反右倾……一脉相承。

它并不来源于一个时期的路线偏向，而是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它表面上似乎有张有弛，忽松忽紧，其实质是“张”和“紧”。意识形态里阶级斗争这根弦总是紧绷着的。今天，这种肃杀氛围在表现形式上似乎与当年有所不同：一般人说几句气话，不至于引来大麻烦。但是，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君不见：曹顺利被逼死于监狱，许志永二审后维持原判。这种肃杀氛围并没有因为千万无辜者的丧生而被驱散。为什么？因为它不仅是毛泽东或刘少奇等等生命有限的人营造出来的，而且更是由寿命更长的一党专制制度产生的。

4）行文至此，我回忆起前些时候读到的清华大学水利系1959届校友知名右派分子党治国的《走出清华园》，文中说到：“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人在生死的分界线上，独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经过了一番思索和挣扎，他终于“恍然大悟，戛然而起。”

这样，中国才有了后来驰骋于经济理论界的杰出学者——党治国。

可惜，明远在明十三陵的田野徘徊的时候，在生死的分界线上，未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选择了自尽，给他的至亲好友包括父母留下了难以言状的悲伤。

#### 四、说说自九一班的另一位文革受难者谭立平同学

无独有偶。在自九一班的同学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自杀的还有一位谭立平同学。他在1958—1959年度，因抑郁等原因退学，长期下落不明。

今年，原自九一班在清华园的同学锲而不舍的调查终于有了突破，获知了立平同学的下落：他1962年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1968年他被当作“特务”关押，起因是游玩舟山时，在海边拍摄了一些风景照。这些照片被认为是有关中国海军的军事秘密，再加上他的父母在香港，立平就这样地被“逻辑推理”为美蒋特务，被造反派关在地下室里“审查”，遭到严刑毒打。打手能一脚把“审查对象”勾倒，然后再把被打者拎起来，再又一脚勾倒，如此接二连三。谭立平把被单撕拧成绳子，打成活扣，挂在窗户上。因为窗户不高，人的脚会着地，不可能竖着上吊，谭立平把身体横坠下去，把绳扣拉紧，窒息而死。由此可知他怀着多大的决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上海没有亲人。因为“罪恶昭著”，致使弟弟不敢按照遗嘱及时前来认领遗物。

我认定史明远和谭立平都是中国一党专制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立平的自杀的外在原因已经不能够仅仅归结为“肃杀的氛围”，而更应该归结为法西斯式的牢笼。

不幸，这样的牢笼如今仍然星罗棋布。

2014—6—15定稿

（高越农，1936年出生。1954年就读清华大学电机系/自动控制系。1959年毕业后先后在衡阳矿冶工程学院和武汉钢铁学院任教。）

□ 来源：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